



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  
搂定宝塔山”，一首《回延安》  
凝聚着人们对延安的向往和对宝  
塔山的仰慕。作为生长在红旗下的  
中华儿女，每次置身于宝塔山下，  
我的内心总是无法平静，因为  
这里留存了我们一家三代难以  
忘怀的记忆。

爷爷出生于民国，十岁时，爷爷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，为了有口饭吃，爷爷去给地主做长工，后来因为不堪忍受地主的虐待，便偷跑了出来。正当爷爷走投无路时，遇到了一位好心地主，他和爷爷说，不想过苦日子就去延安找八路军。可是爷爷从没出过门，不知道延安在哪，那

位先生告诉他，宝塔山耸立的地方就是延安。不想再受人压迫，爷爷决定去延安，他一路乞讨和打问，历经磨难后终于望见了革命的灯塔。爷爷曾对我说，那时候找到宝塔，感觉就像找到了希望一样。后来，爷爷在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，经过部队的培养和锻炼，他成长得很快，几年后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爷爷的熏陶下，父亲从小就对共产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。在父亲18岁那年，延安征兵，父亲积极报名参了军。当兵走的前一天，爷爷领着他上了一次宝塔山。望着这座给人以精神力量的宝塔，爷爷嘱咐父亲：“去部队

# 父亲的抗美援朝

☐ 陈柏清

关于父亲，每每思之难寐。有关他的一些记忆零散如窗外白云，在脑海中飘荡。

父亲活着时，总是在忙碌。他说，他在替许多人活着。唯有讲故事时，是关于他轻松的记忆。

父亲喜欢小酌，晚饭後昏暗的、15瓦的玻璃灯泡下，父亲的脸微酡，故事便滔滔不绝而来。父亲1951年入朝时，虽然刚刚20出头，已经是一个有着六七年兵龄的老战士。他13岁参军，解放东北时跟着首长做通讯员。沈阳解放了，他年龄太小，没批准去南方，就地安置，又在军政大学上了一年多学，就作为汽车押运兵去了朝鲜。父亲感慨颇深，他说，“人们捐东西，宁可自己饿着。有的人家把结婚的新棉被、老人的装老衣都捐出来了，实在没东西捐，咸菜缸里的咸菜自己家都不留，捐出来。谁家没捐，觉得是老丢人的一件事儿。”母亲在一旁笑着说，“我们家把米都捐了，喝了好几个月的稀粥，吃野菜团子。”我们听了都觉得稀奇。长大后，看一些文献资料，说华侨还捐飞机大炮，我们都觉得很真实。

大家一腔热血，保家卫国，支持朝鲜。可新入伍的年轻人都没战场经验，按父亲的话说：“都是新兵蛋子，扔下锄头就扛枪。过鸭绿江大桥，美国飞机扔炸弹，不会躲炮弹，首长喊卧倒卧倒，大家还往前冲，死了很多人。”父亲叹息地摇摇头。哥哥不太信，说炮弹怎么能躲呢？父亲说，“这个有学问，各种炮弹什么声音，从哪个方向来，经常上战场的老兵都可以搞明白。”

父亲押运去朝鲜的车队拉的都是炮弹，为了躲避轰炸，昼伏夜出，他的这些战场经验起了很大作用。一路上颠簸就不算了，还要每人一把工兵锹，不时修补被炸坏的公路。朝鲜当地的老百姓对志愿军特别好，有什么困难，朝鲜的向导到村子里去，哪

## 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# 宝塔山下

□张淑兰

好好干，争取早日入党。”到部队后，父亲牢记爷爷的嘱托，白天认真训练，晚上看书学习，看见脏活累活就抢着干，发现有人损害国家利益就拼命去维护。由于表现好，父亲在部队第三年就入了党。

我小时候是听着爷爷和父亲讲述的革命故事长大的。那时,只要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做啥,我就说要成为像爷爷和父亲那样的人。可是上大学的时候,我曾两次递交入党申请书都没通过审核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父亲带着我爬了一次宝塔山。在宝塔下面，他问了我两个问题：“你为什么要入党？入党前准备怎样做？”这问题看似简单，但我却一时回答不上来。父亲凝望着宝塔对我说，你爷爷从地主家逃出来后，是共产党给了他一碗饭吃，是共产党给了他一个家。你爷爷是一

个懂得感恩的人，所以参军后就特别能吃苦，不但能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思想觉悟也一直在提高。当时参加革命，就意味着要流血牺牲，但他不怕，不管是挖战壕、修工事，还是上前方打仗，总是干在前，冲在前，在他心里，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。

听完父亲的话，我有些惭愧。在学校，我只顾埋头苦学，很少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虽然成绩优异，但当有人遇到困难，我却退缩一边。天色暗了下来，宝塔山上灯火通明，父亲叮嘱我，要传承好延安精神，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，一定要心系人民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身先士卒。我仰头再看宝塔时，发现它比白天更加神圣，那闪耀的光芒，照亮着我前行的路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进了一家石

# 回忆“遇见”的时光

——读马未都散文集《背影》

□张光茫

作为一名文化学者、收藏大家，马未都的个人经历一直为人所好奇。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创办出国内第一家私人博物馆？他的人生经历又是什么样的？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本散文集《背影》中，一窥马未都成功的秘密，见证他过往的青葱与峥嵘。

《背影》是马未都为故去亲友所作，书中人物身份各异、亲疏有别，但都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。从文学编辑到收藏大家的过程中，马未都与各种人物结缘，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，也成为他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。25个人，25篇文章，马未都回忆与友人“遇见”的时光，记录他们真挚的性灵。我们也得以从马未都与这些友人交往的侧写中，看到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，折射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文化热、收藏热，在历史的河流中，见证时代与人风云际会的珍贵片段。

如今马未都活跃在大众荧屏，传播收藏知识。但是鲜有人知道，并非专业出身的他，是凭着一腔热爱才走上了收藏之路。书中马未都记叙了他早年收藏的经历。生于1955年的他，插队下过乡，做过机车钳工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调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，发掘了现今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家的小说。业余时间，他喜欢到琉璃厂淘宝。那时的古董店只有持外汇券的人才能进入，马未都自嘲：“我年轻时瘦，给人印象不如胖子憨厚，加上遇事反应又快，估计别人看我像是心怀鬼胎。”

作为重要的亲人，马未都特意将写父亲的一篇《镆铘岛人》放在开篇位置。父亲马丹林，一个胶东半岛盐碱地的农家子弟，十几岁参加革命，从



指导员、教导员到政委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参加了大大小小多场战役。马未都写：“父亲开朗，小时候我印象中的他永远是乐呵呵的，连战争的残酷都以轻松的口吻叙述，从不渲染。”这样的人生态度影响着马未都的成长，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性格品质，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坚强与乐观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能打成一片。

马未都饱含真情的文字，侧面写出了他的成长轨迹。有他的接生医生、林巧稚的高徒、全中国最权威的妇产科专家叶惠芳；第一次发表小说受到作家刘绍棠的垂青，写信让马未都去聊天；年轻时在叶圣陶家书架上认识了翻译家傅雷，看到了他的译著《高老头》，还不小心弄丢了这本傅雷题签给叶圣陶的签名书。

从不同的藏家身上，马未都看到了不同的人生观，收藏的意义也不尽相同。对于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来说，收藏是玩；而对另一位收藏大佬王季迁来说，收藏是守。马未都与王世襄认识的时间大约30岁，王世襄已经71岁，“当时他并没有受社会重视，他很冷清的，你去他们家，什么时候

油企业，成了一名采油工。采油一线的工作很辛苦，环境恶劣不说，还常要和盗油分子做斗争。每次上班，我总是恪尽职守，整天泡在井场解决油井问题。一旦站内出现险情，不管夜里几点，我都会迅速赶到。

一天黄昏，我和一名工友在巡井时发现有人在油罐前放油。见此情景，我大喝一声便冲上去阻止。面对偷油贼，我和工友临危不惧，与他殊死搏斗，保护了国家财产。后来有人问我，你哪儿来的勇气，我说，当时没多想，从小就被革命烈士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事迹所感动，大概这就是一种本能吧。

后来，单位派我出去学习，除了钻研专业技术，我还积极参加一些公益活动，拉近了我与党的距离。回来后，我鼓起勇气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经过组织的考验，两年后，我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

现在，每当我仰望宝塔时，眼前总会闪出一面面党旗，它们似盏盏明灯，照亮我的信仰，炽热而明亮！

都是他自己，没有外人。不像等到他80多岁的时候，中国古典家具也热了，黄花梨家具、紫檀家具都热了，找他的人络绎不绝，那时候我就退场了，我觉得人生跟舞台没什么区别，没人的时候你上去可以表演，满台都是表演者的时候，你可以撤退变成一个观众。”

《背影》中看似写的是别人，但也是作者自况。马未都写陶瓷考古研究者刘新园：“陶瓷鉴定早些年是个冷门学问，偌大的中国能对陶瓷迅速做出判断的总共就三五个人。有名的我都接触过，每个人风格不一，大开大合者有之，中规中矩者有之，谨小慎微者有之；刘先生为前者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从不藏着掖着，一听就让人痛快。”后来陶瓷收藏热了，鉴定家就成了香饽饽，坐头等舱了，拿鉴定费了，大鉴定家费话就不由衷了，大鉴定家们立马分出了高下，这高下实际上就是人品。

马未都评价故友，两三个字就神乎其神的高度概括：“金槌”朱生壬、“画家”陈逸飞、“作家”刘绍棠、“侠客”刘新国、“大佬”王季迁，让我们瞬间就能记住这些人物的身份和特点。而马未都的话，更有“醒世恒言”的味道：“如果社会是个江湖，没必要把见到的船都翻个底儿掉，给别人留路，也是给自己留后路。”“人在江湖飘，谁都有软肋，谁也不可能刀枪不入。”这些话都是人生经验，中肯之见。

马未都都在收藏方面耕耘多年，其见解独到和精细程度都是可以信赖的。这本书读着读着，有时会觉得会心一笑，有时又对书中人物肃然起敬。读过后意识到这些人都已仙逝，顿觉生命之须臾，更让人生出应在以后的日子里珍惜光阴，珍惜朋友之感！

